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 县域经济发展

熊小林 李拓

内容提要: 本文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收敛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同时在考虑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5年河南省108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与财政分权有助于县域经济发展;从按财政属性进行县域分类的视角看,上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不具有特殊财政属性的普通县层面;从按经济水平分类视角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作用于经济基础好的中心县与经济落后的农区县;从按地理位置分类视角看,临近市辖区的县更好地发挥了上述促进作用,形成了依托市辖区发展的“溢出效应”。

关键词: 基本公共服务; 财政分权; 县域经济发展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18.02.006

中图分类号: 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565(2018)02-0066-09

Basic Public Servic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y Development

Xiong Xiaolin & Li Tuo

Abstract: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factor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ncome equalization. It takes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i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08 countie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5 to test the impac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whole perspective,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e, the support effects mainly manifestes in the ordinary counties without special financial attrib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level, it mainly manifestes in the center counties and agricultural coun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level, the counties near the city area play the mor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 and form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Basic Public Servic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区划为基本范围,以县城为核心,以农业为基础,以特色产业与城镇化为重要驱动力的我国国民经济基本单元。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从经济结构角度看,县域经济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依托地方资源禀赋特色发展起来的,产业特色明显、基础性建设短缺的不完备综合经济;从发展模式角度看,县域经济则是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要素配置相结合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因此要

研究县域经济,就必须结合其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政府主导作用明显、区域特色较为显著的主要特征,以及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村地区发展比较滞后的主要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关,基本公共服务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重要层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的关键举措(Zhang 2004)^[1]。地方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体系的有效运转,因此财政分权可能成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同时公共服务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财政支出(李斌 2015)^[2]。因此,要研究县域经济有必要首先厘清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效应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Inshakov(2015)^[3]运用俄罗斯数据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二者弱相关。国内较多学者则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方茜(2014)^[4]基于静态结构分析技术的研究认为我国公共服务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吕炜(2007)^[5]指出公共服务通过抑制收入差距扩大,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带来好处的能力。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或渠道的差异性,马慧强(2016)^[6]指出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有关财政分权影响经济问题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Oates(1985)^[7]认为财政分权加大了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林春(2017)^[8]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庄子银(2003)^[9]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体制变革下的公共支出成本增加,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程宇丹(2015)^[10]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此外,卢盛峰(2017)^[11]使用纯数据推动的合成控制评估思路,分析了政府推动型城市化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探析了政府行政主导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待改进之处:①现有成果缺乏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开展的系统性研究。②现有研究多以GDP为标尺,不能体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忽略了转型升级和社会民生等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③相关实证研究对县域经济的关注度较低且忽略了县域经济的差异性。

本文尝试在以下层面进行改进:首先,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并选择县域人口众多、县域经济规模庞大的河南省作为研究样本。基于2005—2015年河南省108个县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与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收敛三个层面衡量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探讨基本公共服务与财政分权的经济发展效应。第三,分别从财政视角、经济视角、地理视角对河南省108个县进行分类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基本公共服务与财政分权对不同类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要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必须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量化测度。基于数据可得性并参照现有研究成果,本文从教育发展、医疗卫生、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四个主要层面选取11个三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以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人均公共服务享有量为标准对2005—2015年河南省108个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评价。同时在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使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以保障测算结果的客观性。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法	权重
教育发展	小学教育状况	小学在校生巩固率	0.037
	初中教育状况	初中在校生巩固率	0.059
医疗卫生	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数	0.088
	人均执业医师数	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人数	0.081
经济基础	人均固定电话数	固定电话用户/常住人口	0.044
	农业人均用电量	农业用电量/农村人口数	0.064
社会保障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	城镇参保人数/城镇人口数	0.158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	城镇参保人数/城镇人口数	0.160
	新农合作医疗保险覆盖率	农村参保人数/农村人口数	0.109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农村参保人数/农村人口数	0.062
	人均福利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的福利机构床位数	0.137

注:原始数据来自《河南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文计算了2005—2015年河南省108个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计算结果显示,河南省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本文的县域分类方法(后文详述)发现:从财政视角看,拥有财政特权的扩权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小幅波动下降趋势,而没有财政特权的普通县及受到中央财政重点补贴的贫困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则呈上升趋势,且贫困县增长最快;从经济视角看,发展状况好的中心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变化趋势不明显,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农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则增长最快;从地理视角看,按照是否临近本地市辖区划分,临市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略高于偏远县。县与县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对县域分类回归的必要性。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如上文所述,县域经济发展应关注于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农村发展比较滞后这三个根本问题,因此本文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乡收入收敛三个层面衡量县域经济发展。具体而言,经济规模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是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县域经济中农业占比仍然偏高,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升级仍需加力,因此产业升级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三农问题是县域经济的基本问题,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是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表现。在计量方法层面,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使用截面数据的Moran's I指数对经济发展各指标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经济发展指标各年度Moran's I指数

指标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经济增长(LnRGDP)	0.552*** (9.12)	0.542*** (8.94)	0.513*** (8.48)	0.506*** (8.38)	0.502*** (8.31)
产业结构升级(STR)	0.397*** (6.99)	0.403*** (7.12)	0.416*** (7.71)	0.518*** (8.09)	0.419*** (7.62)
收入收敛(INCOME)	0.483*** (8.61)	0.588*** (9.60)	0.562*** (9.47)	0.501*** (9.22)	0.499*** (8.83)

注:***、**、* 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值。

检验结果显示,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应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构建如下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Y_{i(t-1)} + \rho W \times Y_{it} + \alpha_2 LnPUB_{it} + \alpha_3 FD_{it} + \alpha_4 LnPUB_{it} \times FD_{it} + \alpha_5 INV_{it} + \alpha_6 URB_{it} + \alpha_7 DOF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县,ε_{it}为随机干扰项。Y_{it}表示经济发展,分别代表经济增长(LnRGDP_{it})、产业结构升级(STR_{it})及城乡收入收敛(INCOME_{it})。使用以2005年为基期平减的人均GDP衡量县域经济增长(LnRGDP_{it});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STR_{it});使用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收敛($INCOME_{it}$)。 $Y_{i(t-1)}$ 代表各因变量的滞后一期,以考察经济发展的时间惯性。 ρ 为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系数, W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相邻矩阵,即两县地理相邻记为1,不相邻记为0。 $LnPUB_{it}$ 表示上文测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FD_{it} 表示财政分权,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值,即财政自给度衡量财政分权;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权大小会直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因此设置交叉项 $LnPUB_{it} \times FD_{it}$ 来考察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的间接影响。其他为控制变量, FD_{it} 为固定资产投资,用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县GDP的比值表示; URB_{it} 为城镇化,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县总人口的比例表示; DOF_{it} 为金融发展,用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县GDP之比表示。本文所涉及2005—2015年河南省108个县的相关数据来自2006—2016年度的《河南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为保障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非比例变量经济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进行了对数处理。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释义	Obs	均值	S. D.	最小值	最大值
LnRGDP	经济增长	1188	9.086	0.443	8.171	10.236
STR	产业结构升级	1188	0.517	0.137	0.212	0.889
INCOME	收入收敛	1188	0.451	0.085	0.281	0.905
LnPUB	基本公共服务	1188	2.228	0.063	2.038	2.457
FD	财政分权	1188	0.329	0.192	0.079	1.208
INV	固定资产投资	1188	0.702	0.267	0.160	1.709
URB	城镇化	1188	0.199	0.116	0.011	0.888
DOF	金融发展	1188	0.987	0.311	0.384	1.992

(三) 县域分类

为探析不同类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本文进一步从财政、经济、地理三个视角对河南省108个县进行分类回归。地方政府主导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财政则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国家级贫困县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可以从中央财政获取数量可观的扶贫补贴,这些县可划为“贫困县”(共31个);自2004年开始,河南省政府扩大了部分县的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2011年进一步将部分县市升级为省直管县,县财政自由度进一步提升,这些县可划为“扩权县”(共41个,不包括国家级贫困县);其余的36个县可划为“普通县”。资源禀赋的差异也导致了各县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不同经济状况的县其发展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参照河南省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报告》的分析结果,本文将被该报告评价为“纳入中心城市组团发展范围”的55个县市定义为“中心县”;将被评价为基础条件比较好的19个县市定义为“较好县”;其他34个县将被划归为“农区县”。此外,地理临近经济发达地区即可能享受“溢出效应”也可能遭遇“虹吸效应”,本文将与本市市辖区地理相接的县定义为“临市县”,将其他县定义为“偏远县”,以考察县域维度的这种区域经济关联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整体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整体视角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及财政分权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M1反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2反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M3反映对城乡收入收敛的影响。从检验统计量的回归结果看,M1-M3的Log likelihood均很大而AIS、SC统计量均很小,表明所设定的空间计量模型优于普通线性模型;各模型Moran's I统计量及

空间相关性系数 ρ 均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从整体上看县域经济发展仍表现出很强的空间集聚性;各模型的 Adj-R² 均在 0.4 以上,表明所选取的解释变量较好地囊括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均高度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体现出明显的时间惯性。

表 4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M1	M2	M3
	经济增长(LnRGDP)	产业结构升级(STR)	收入收入(INCOME)
Y(-1)	0.895 *** (9.82)	0.191 *** (5.97)	0.610 *** (5.68)
ρ	0.213 *** (14.19)	0.133 *** (6.28)	0.206 *** (6.75)
LnPUB	0.189 *** (3.72)	0.613 ** (2.25)	0.176 *** (3.31)
FD	0.449 *** (4.22)	-0.874 (-0.61)	0.639 *** (3.66)
LnPUB × FD	-0.147 ** (-2.17)	0.573 (0.36)	-0.025 (-1.28)
INV	0.259 *** (4.52)	0.522 *** (9.16)	0.033 (0.73)
URB	1.241 *** (9.61)	0.684 *** (9.67)	0.111 *** (3.87)
DOF	-0.115 ** (-2.24)	-0.127 *** (-3.67)	-0.060 *** (-5.32)
Moran's I	0.572 *** (16.38)	0.610 *** (19.26)	0.319 *** (6.57)
Adj-R ²	0.637	0.507	0.496
Log likelihood	398.776	645.197	874.119
AIC	0.019	0.006	0.003
SC	0.021	0.006	0.003

注: ***、**、*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下显著,各变量括号内为 t 值, Moran's I 括号内为 z 值。

变量 LnPUB 在各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正,表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以从整体上促进河南省县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收敛。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带动投资、拉动居民消费、集聚人力资本等多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教育及社会服务带动的人力资本提升及消费需求增加也有助于带动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在降低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并保障其劳动力能力,从直接与间接两个层面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更快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变量 FD 在模型 M1 及 M3 中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正向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显示地方政府财权扩大、财政自给度提高有助于发挥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指导作用;县级政府财权的扩大有助于从客观上发挥财政的支农作用,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进步。交叉项 LnPUB × FD 在模型 M1 中显著为负,表明县级政府财权扩大并没有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偏向于支持经济拉动作用较强的生产性产业发展,地方财权扩大可能加大地方政府经济偏向性的财政支出,从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从控制变量看,INV 在模型 M1 与 M2 中均高度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仍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促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这种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较好的社会民生效应。变量 URB 在各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正,表明大力推进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变量 DOF 在各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掣肘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其原因在于县域金融的资金约束、单一性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及行政干预下的金融机构的低效率(高晓燕,2013)^[12]。

(二) 财政视角的分类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县域发展异质性较强,分类回归能更为准确地体现相关因素对各类县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根据上文所述分类方法,首先分析按财政视角分类的扩权县、普通县及贫困县的经济状况。由于分类后不适用空间计量模型,因此分类回归均使用普通面板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从模型 M4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普通县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对贫困县产生相对较小的积极影响,但对扩权县的影响则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扩权县政府由于决策自主权更大,因此倾向于发展产业而非公共服务,普通县与贫困县的发展自主权相对较小,而这种自

上而下按部就班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却从长期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变量只对普通县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财权最小的普通县政府亟需通过自主的财权引导区域经济增长,因此财政自主权扩大对普通县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交叉项 $\text{LnPUB} \times \text{FD}$ 在普通县的回归结果中显著为负,表明财政自主权的扩大也会导致政府偏向经济领域的财政投入,从而抑制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变量 INV 和 URB 在各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不管县域财政特性如何,投资和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都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变量 DOF 在各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负,表明县域金融发展的整体性滞后拖累经济增长。模型 M5 的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与财政分权均仅对普通县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无论是自主权的下放或中央财政对贫困县的补贴都会导致县级政府政策偏向性或自我发展动力不足,从而抑制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与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交叉项 $\text{LnPUB} \times \text{FD}$ 在普通县的回归结果中显著为负,再次印证了财权扩张导致地方财政向经济领域倾斜的强烈意愿。变量 URB 仅在普通县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对普通县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对其他类型县的支持作用不明显。模型 M6 的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与财权的扩大有利于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其原因可能在于贫困县接受的财政补贴具有定向扶贫的支出要求。从控制变量看,固定资产投资对各类县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作用不明显,表明投资可能存在城镇偏向性。

表 5 财政视角的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M4			M5			M6		
	经济增长(LnRGDP)			产业结构升级(STR)			收入收敛(INCOME)		
	扩权县	普通县	贫困县	扩权县	普通县	贫困县	扩权县	普通县	贫困县
LnPUB	0.187 (1.08)	1.380*** (4.09)	0.051* (1.87)	-0.102 (-0.67)	0.347*** (3.70)	0.085 (0.93)	0.040 (0.40)	0.155 (1.26)	0.017*** (6.25)
FD	0.328 (1.50)	1.434*** (2.61)	0.076 (0.35)	-0.211 (-0.31)	1.430*** (3.07)	0.137 (1.54)	0.335 (0.75)	0.222 (0.43)	0.101** (2.07)
LnPUB × FD	-0.294 (-1.19)	-0.494*** (-2.72)	-0.193 (-0.45)	0.052 (0.18)	-1.176*** (-3.29)	-0.319 (-0.99)	-0.133 (-0.67)	-0.069 (-0.30)	-0.019 (-0.81)
INV	0.204*** (4.62)	0.404*** (8.33)	0.235*** (4.25)	0.028** (2.13)	0.117*** (8.68)	0.195*** (4.59)	-0.018 (-1.19)	0.025 (0.97)	0.531 (0.67)
URB	0.091** (2.11)	0.446*** (3.89)	1.030*** (6.57)	0.014 (1.02)	0.054* (1.69)	0.134 (1.45)	0.124*** (6.54)	0.217*** (10.54)	0.010*** (3.81)
DOF	-0.259*** (-5.32)	-0.421*** (-6.57)	-0.052* (1.79)	-0.082*** (-4.12)	-0.167*** (-9.39)	-0.107* (-1.72)	0.032** (2.11)	-0.005 (-0.48)	-0.212*** (-3.31)
R ²	0.521	0.398	0.424	0.121	0.363	0.386	0.187	0.328	0.588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下显著,各变量括号内为 t 值。

(三) 经济视角的分类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中心县、较好县和农区县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 M7 的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对中心县和农区县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对中心县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主要表现为刺激消费增加;对农区县的促进作用则可能主要表现为补充原本过于薄弱的经济社会基础与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县级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上升同样主要表现为促进中心县与农区县经济增长,中心县财权扩大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农区县财政自给度的上升则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从而发挥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引导作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较好县即没有中心县的产业基础与发展活力,也没有农区县在较低经济水平状态下的后发优势,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与财政分权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变量 $\text{LnPUB} \times \text{FD}$ 显著为负,再次表明地方财权的扩大会导致财政向经济

领域过度倾斜。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投资与城镇化仍是拉动经济的引擎,县域金融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模型 M8 的回归结果与 M7 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与财政分权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仍主要表现在中心县与农区县层面,而介于发展中间阶段的较好县则没有很好地利用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与财政分权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模型 M9 的回归结果同样显示出类似的结果,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与财权扩张通过带动中心县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区县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与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则有助于快速提升最贫困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从而缩小城乡间的经济差距。

表 6 经济视角的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M7			M8			M9		
	经济增长(LnRGDP)			产业结构升级(STR)			收入收敛(INCOME)		
	中心县	较好县	农区县	中心县	较好县	农区县	中心县	较好县	农区县
LnPUB	0.661*** (3.21)	-0.125 (-0.27)	1.891*** (4.68)	0.113* (1.65)	0.108 (0.57)	0.248** (2.37)	0.152*** (3.01)	0.045 (0.52)	0.202*** (3.04)
FD	0.614** (2.42)	-0.098 (-0.04)	1.244*** (3.10)	0.511*** (3.56)	0.817 (0.81)	0.258 (1.19)	0.836*** (2.76)	-0.304 (-0.67)	1.657** (2.52)
LnPUB × FD	-0.278** (-2.50)	-0.216 (-1.02)	-1.036*** (-3.34)	-0.268*** (-3.06)	-0.302 (-0.69)	-0.240*** (-2.65)	-0.349*** (-2.62)	0.132 (0.66)	-0.682** (-2.18)
INV	0.323*** (8.56)	0.223*** (4.71)	0.327*** (5.45)	0.120*** (9.62)	0.023* (1.77)	0.103*** (6.64)	-0.031*** (-8.56)	0.041* (1.81)	0.012 (1.22)
URB	0.154** (2.17)	-0.054 (-0.47)	1.145*** (8.65)	-0.033 (-1.44)	0.022 (0.47)	0.117*** (3.41)	0.149*** (8.56)	0.155*** (7.31)	0.113*** (5.24)
DOF	-0.273*** (-5.44)	-0.345*** (-4.81)	-0.228*** (-3.62)	-0.127*** (-7.64)	-0.120*** (-4.12)	-0.098*** (-6.00)	0.023* (1.86)	0.025* (1.84)	-0.028*** (-3.66)
R ²	0.232	0.199	0.518	0.221	0.141	0.316	0.201	0.358	0.230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下显著,各变量括号内为 t 值。

(四) 地理位置的分类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与本地市辖区是否相邻,将 108 个县划分为临市县和偏远县,考察县域经济发展是否存在“虹吸效应”或“溢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从模型 M10 的回归结果看,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及财政分权都对临市县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直接影响,但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对偏远县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财政分权反而不利于其经济增长,表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临市县更好地利用市辖区完善的产业体系发展自身经济,县政府财权的扩大也有利于进一步引导地方经济发展,但偏远县由于缺乏产业基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同时也缺乏财政通过产业渠道为经济注入活力的机制,因此财政分权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从增长角度看,河南省各市辖区对周边临近县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模型 M11 的回归结果与 M10 类似,公共服务提升及财政分权都对促进临市县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临市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财政能力强有助于吸引企业入驻。从模型 M12 的回归结果看,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对城乡收入收敛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别,这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的直接作用和教育医疗带来的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财政分权则显著提高了临市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偏远县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入驻带动了农民增收。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即临近市辖区的县依托区位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此外,从控制变量看,投资增长与金融发展对临市县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好于偏远县,进一步证明了靠近市区可以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地理性差异。

表 7 地理位置的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M10		M11		M12	
	经济增长(LnRGDP)		产业结构升级(STR)		收入收敛(INCOME)	
	临市县	偏远县	临市县	偏远县	临市县	偏远县
LnPUB	1.002 *** (3.49)	0.969(1.38)	0.431 ** (2.15)	0.306(1.45)	0.166 *** (3.48)	0.149 *** (4.05)
FD	0.918 ** (2.17)	-0.552 ** (-2.27)	1.408 * (1.92)	1.210(0.85)	0.634 ** (2.13)	0.386(1.55)
LnPUB × FD	0.301(1.24)	-0.294(-1.12)	1.153 ** (2.09)	-0.597(-0.97)	0.271(1.06)	-0.124(-1.55)
INV	0.354 *** (2.90)	0.429(1.43)	0.134 * (1.83)	0.067 * (1.78)	0.028 *** (3.23)	0.011 * (1.74)
URB	1.313 *** (5.53)	0.382 *** (3.67)	0.590 *** (8.37)	0.152 *** (3.88)	0.187 *** (11.12)	0.141 *** (10.96)
DOF	0.299 * (1.81)	-0.101 * (-1.69)	0.120 ** (2.15)	-0.078 * (-1.78)	0.033 *** (2.80)	-0.006(-0.74)
R ²	0.176	0.169	0.223	0.219	0.363	0.355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下显著,各变量括号内为 t 值。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5—2015 年河南省 108 个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收敛三个层面,从整体与分类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从整体上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利于河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的减小;但财政分权易于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形成挤出。②从财政分类视角看,上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不具有特殊财政属性的普通县,过度下放的财政权力并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③从经济水平分类视角看,上述促进作用主要作用于经济基础好的中心县与经济落后的农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与财政分权通过促进消费及提升经济活力等途径助力中心县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补短板”促进落后农区县的经济发展。④从地理位置角度看,临近本市市辖区的县获得了更好的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政府财政权力的扩大都有效支持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良性的“溢出效应”。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金融则未能对县域经济发展形成良好支持。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得出相应政策启示:

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提高县域工业化水平和社会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央及省市级政府应制定针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规划,并通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县级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虽然有助于发展地方经济,但易于导致过度的经济偏向性而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挤出,为此中央及省政府在下放财政权限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及管理方式的监督指导;但从更深层次分析,县级政府的经济偏向意愿主要源自以 GDP 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与晋升体制,因此中央政府应从宏观角度调整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模式,加强对社会民生建设政绩的评估。

从县域财政属性视角看,过度下放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权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经济效应的发挥,因此省政府应谨慎发放扩权县或省直管县“牌照”。中央政府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财政补贴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积极作用,应继续完善政策,加大精准扶贫工作实施力度,更好地发挥扶贫补贴的作用。

从县域经济水平层面看,发展较好的中心县与经济落后的农区县较好地突出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效应,因此省政府应鼓励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进一步加快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对经济水平落后的农区县则需采用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扶助其基本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

从地理位置层面看,临近市辖区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利于附近县的经济发展,临市县政府应

该充分认识到并积极利用这种优势,进一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吸引企业入驻促进经济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还可能导致县域发展的分化,为此省市应加大对偏远县的扶持力度,通过增加对偏远县区投资,加速偏远县区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带动县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Zhang J, Zhang J. How does social secur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4, 17(3): 473-500.
- [2] 李斌, 李拓, 朱业. 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基于中国 286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J]. *中国软科学*, 2015(6): 79-90.
- [3] Inshakov O, Kalinina A, Vasily V. To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ree Economic Society of Russia. Contribution of Scientists-Economists of Volgograd State Univers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l-gograd Region [J]. *Journal of Tropical Meteorology*, 2015, 8(1): 98-104.
- [4] 方茜. 基于 ISM 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 2014(1): 49-52.
- [5] 吕炜, 赵佳佳.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与收入分配调节 [J]. *财贸经济*, 2007(5): 45-52.
- [6] 马慧强, 王清.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性空间格局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6(9): 71-77.
- [7] Oates WE. Searching for Leviathan: An Empirical Stud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4): 48-57.
- [8] 林春.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J]. *财政研究*, 2017(2): 73-83.
- [9] 庄子银, 邹薇.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3(7): 4-12.
- [10] 程宇丹, 龚六堂. 财政分权下的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 [J]. *世界经济*, 2015(11): 3-28.
- [11] 卢盛峰, 陈思霞, 张东杰.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吗 [J]. *统计研究*, 2017, 34(5): 59-68.
- [12] 高晓燕, 杜金向, 马丽. 我国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东、中、西部 47 个县域的数据分析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12): 43-49.

作者简介

熊小林,女,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

李拓,男,201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分析。

(责任编辑:方原)